

21世纪北美华文文学20年

21世纪文学20年

新变与挑战

戴瑶琴

1965年,於梨华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发表成为北美华文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牟天磊无比感伤的那段话“没有具体的苦可讲……那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回旋于20世纪近40年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白先勇称於梨华为“没有根的一代”代言人,而“融不进去”的“文化隔膜”落实为美华文学的创作母题。2004年,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于於梨华小说的阅读体验收入《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为序:“几十年来,於梨华以几代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的性格、经历和心理状态为题,写了极成功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几十年来,她和她的几代留学生们,累积了甜的、苦的、欢乐的、痛苦的、触及灵魂的人生经历。当然她的读者们也同时累积了多种人生经历,她们和他们会从这本小说中看到她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影子。”他以亲历者身份完成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有价值的“留学生文学”研究参考。2020年5月1日,於梨华在美国辞世。她见证了美华文学发展,由其小说呈现的两个基础事实——“隔”与“无根”,牵动系列中西比较的宏大论题,被后续的华文文学创作者从价值观和文化观两个维度加以夯实后推进。

北美是世界华文文学重镇,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率先提出“无根”命题;新世纪20年间,北美华文文学表现出两次题材转折(他国故事—中国故事—他国故事)、两拨作者接力(台湾留学生和内地新移民)、两个国家创作力量消长(美国和加拿大),新颖的文学构思、艺术立场和生命阐释得以交流互通。但北美华文文学学术史存在散点式与突现式的研究事实。我选择作者一写什么—怎么写的简单逻辑,对美华文学的亮点实施缝合及整合,阐释其创想与创新、狭隘或保守。

新生代

北美华文文学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代际序列,即“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同时每个“身份共同体”都储备着代表作家。代际划分固然还是比较粗略的,但其昭示的创作接力显现华文文学的良性稳定发展。若抛开“新生代”概念的特定指向,而仅圈定“新”,20年间的每一次代际更迭都是“后浪”出场,携带明确的文化理念和文学野心。

20世纪70年代末,“新移民文学”崛起,与“留学生文学”相比,其特点一是写作主力从台湾留学生转向内地留学生;二是创作者深化文化“夹缝”中的心理困境,更是陆续布局“落地生根”后的生活景观。21世纪初,“新移民文学”创作群被不断加固,它逐步与“留学生”脱钩,一方面是“留学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一方面是不同背景的“新移民”加盟华文文学。人生经验的充实,叠加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继而活化为生活的广度与人性的深度。严歌苓、张翎、陈河是最具有辨识度的美华作家,也是学界研究跟踪较多的作家。他们写作

起步很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已被归入“新移民”,作品更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实绩,但并非纯然文学“新人”。他们以相异的题材偏爱、语言方式和艺术理解,形成文学品牌。与此同时,陈谦、曾晓文、施雨、薛忆尧等“中生代”基于个人经历和对异国生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开发,印刻着北美华文文学的微观路向。

2010年前后,“70后”作家开始发力。他们中一部分是在中国内地已有知名度的创作者,移居北美后继续写作;一部分是文学新人。李凤群、张惠雯、柳营、凌岚、凌珊、李一楠等,已明确个人擅长的题材领域,确立个人舒适的语言风格。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他国故事,他们重视其背后指向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我认为,“70后”引发的新变,并不是仅仅从作品中反思与质询社会现实,这已是“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都具备的文学功能,而是他们坚持主动探寻并质疑的行为本身,折射出对独立思考与自我表达的尊重和坚守。近年,“90后”作者已然浮出水面,但他们会给北美华文文学制造出怎样的新变,还需要通过一定数量作品来检视。

他国故事

“他国故事”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创作亮点。作家从对异国故事(现状与问题)的白描,转向对中国本土叙事资源(历史与文化的)的调度。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丛明等从家国情切入,建立“无根”乡愁美学。80年代美国新移民小说的贡献不是呈现“无根”的事实,而是反思“无根”的原因,通过回国“寻根”的方式求解,将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等深度思考纳入对“无根”现状的考察。它与中国内地“寻根文学”交集于相似时间节点,海外和内地,不谋而合地形成“寻根”想法呼应,但提出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并不相同。应该说,此时“他国故事”正逐步脱离故事层面,提升至哲学层面。90年代“新移民”的他国故事,辐辏在50-70年代的家族故事。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缠绕捆绑,但缺少些新意及锐见。近十年美华文学的“他国故事”,与世界华文文学“他国故事”书写保持同步:以理性思考取代感性叙述,强调对普通生命的敬畏与尊重。2009年《金山》里,方家三兄妹锦山、锦河、锦绣连缀起的“山河锦绣”寓意,将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推至最高点。

严歌苓对他国故事具有重大贡献。她开启一种写作模式,也固化了一种写作模式。这个固化,主要是指她的成功对其他作家的示范意义。2000年后,她很快从他国故事转向他国故事书写,仅以近十年的长篇为例,她发表了《赴宴者》(2006)、《金陵十三钗》(2007)、《第九个寡妇》(2008)、《小姨多鹤》(2008)、《寄居者》(2009)、《一个女人的史诗》(2010)、《陆犯焉识》(2011)、《妈阁是座城》(2014)、《老师好美》(2014)、《床畔》(2015)、《舞男》(2016)、《芳华》(2017)、《小站》(2020)。从作

家角度,严歌苓持续拓宽“他国故事”的表现层面,在历史/现实、家庭/社会、个人经验/时代热点、既有困境/当下境遇等多重逻辑关系中进行转换;从作品角度,小说具有独特的问题视角和稳定的情感流向,特别是人物塑造的重点与叙事节奏的拐点,都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

同样面对“他国故事”,“50后”“60后”从空间交错、史实并置中探索文化寻根,而“70后”华人作家更青睐于民间和都市面临的具体问题中讨论中国现实民生,从艺术元素的具象写照中反观中国文化生态,进而推演21世纪中动态化的“失根—寻根”所引渡的文化反思、文化接受、文化互通。“70后”笔下的“他国故事”更是出现关注对象的转移,即从仰视“父亲母亲”转向平视“哥哥姐姐”。可是“他国故事”又形成充满默契的漩涡,数量快速生产、新意反复消耗,“扎堆”现象反证出“他国故事”急剧收缩。受众的阅读经验依然定格在“新移民”个人奋斗史,移民一代“落地生根”后的生活经营,移民二代的当下诉求,无法从北美华文文学中获悉新情况和新问题。陈谦是思考“他国故事”的写作者,硅谷系列和教育系列,实时充盈着华文小说的题材类型,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的注入,推动美华文学与时俱进。张惠雯探测人心的底线和应对,我们无需将其作品细分出中国/他国,她只留意人类精神世界的体积与心理世界的感受。小说的精巧在于于即时的、疏忽间的念头与容量,生发出合情合理的选择。独特诗意是一种张弛有度的掌控力,即刻生效的情景感孵化沉浸式阅读。

我感觉创作者似乎更愿意经营故事,而感情的处理则相对匆促。“具体到人、到群、到世界,小说在刻画着紧张,宣示着矛盾,表达着对立,唯独不书写平庸。我姑且称之为平庸,是因为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就是特别寻常的,平淡到写进小说里,甚至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生活比一切构思都离奇,生活它在自然的发生,而构思难免人工的痕迹。”(戴瑶琴:《心灵隐秘地带的旧轨与新路》,《香港文学》2020年第5期。)大开大阖的中国故事,跌宕起伏,但“落地”困难;人物纷繁攒动,但女性人物比重大,外国人形象始终模糊,甚至可以说,核心人物在身份、行动、经验上的脸谱化、概念化趋向已经显现。作品传达的表现欲较强,急切地想说出主题、技巧和立场,表明各种新发现和探索无形中造成作品十分“紧张”,“真”也都“急”给逐层剥离了。

文化选择

中西文化比较是北美华文文学无法绕开的议题,而继承与创新是创作者需要直面的“怎么写”问题。具体到“中国”书写,不同“身份共同体”的华文作家,事实是一种本能反应。新移民文学的前二十年,美华文学几乎都在重复“边缘”论题,在时间催化下,隔膜感逐级消减,近十年美华文学试图解决写作的“在地”性。袁劲梅在《老康的哲学》里曾运

用“海岸”意象肯定文化差异的必然性,“明摆着,两条海岸线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就是他们各自守着的那片海岸的特殊之处。”当前中西双向审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新移民文学”从“他者”(西方)反观“自我”(中国)的思考惯性被打破,转换为“自我”(华人新移民)观审“他者”(西方本土)的思路。

新世纪初的小说创作,美华作家曾为中西比较找到了一个源发于空间的落点——“交错”,它一度成为“新移民文学”的叙事范式,甚至存续在当前海外华文学小说里。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因一部《交错的彼岸》成为“交错”的技术代表,需要明晰的是,“新移民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中国故事”实际都是“交错”结构,而张翎对于中西“交错”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早期的三部长篇《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邮购新娘》(2004)。2017年出版《劳燕》时,她将空间交错(中国/加拿大)置换为人称交错(我/你/他/她),这一转变表示张翎将交错的形式性让渡于交错的协同性,即她借助人称交错,挖掘人心的不同面向。空间交错,虽然为学者提供了中西比较的研究便利,但拘囿住北美华文文学的艺术构思。AB平行式文化编码一度成为主流,差异的罗致覆盖共性的挖掘,文化互动后文化互鉴的内在向度,亟待强化。

在面向“中国”的时候,创作者找到了乡土。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对故土的历史梳理和现实忧思。今昔对比成为最便捷的切入点,现代化对传统的介入并革新,逐步抹去乡土底色。张惠雯《垂老别》的推进层次及意境与庾信的《征夫》十分契合,人因昔日与明日、恋与死的追忆而感伤,而在她最新小说《昨天》里,透露出新想法,即不必今昔较量,曾经慰藉心灵的美好和良善,永不会变。陈河《碉堡》的“枪眼”是回到家乡的密道,它收藏着一颗“启明星”,以希望、信念和力量指引归途;张翎《廊桥夜话》的“桥”,不疾不徐、不悲不喜地等待现代、包容现代。乡土叙事收藏着每一位华人作家的故乡版本,宏阔深广的家国情怀,落实到寻常人家,就是人与家/故土的依存。

正如石黑一雄所说,有多元文化背景、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作家几乎会本能地在创作中寻根。他指出了“寻根”的必然性,而哈金则解决了“寻根”的方法,即“寻找自身的传统,缠住伟大的对手”。海外华文文学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无法回避的最基础、最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并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美华文学创作者对待“传统”出现两种

明确思路:一是从中国古代史取材并演绎古人古事古物,如《甲骨时光》《李白传》《上古迷思》《凄情纳兰》《故国宫卷》《微云哀草》;二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发掘和文学重构,如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张翎的《金山》《劳燕》、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薛海翔的《长河逐日》。但从客观上看,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没有获得扎实研究,艺术思考更只是浮光掠影地流于形式。

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提出“星系”写作,“星系”的概念,包含有时空观、有包容度、有开放性。新世纪20年,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文学人物和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星系,结构出北美华文文学星群,先行者在陆续离场,创作者不断消失、闪现、交接、聚合。应该说,相当数量的研究者会产生价值低判,是由于不自觉地设定潜在他者为整个中国内地当代文学;从本质上看,北美华文文学就是区域性的文学,怎可能持续、成批出现重量级作家作品?它所能呈现的是某几位代表性作家。拿局部和整体做对比,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创作者自然也需自行搁置“速成”的期待,因文学创作需要常年的积累与打磨。但美华文学经典化确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我想特别提起2000年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在为21世纪北美华文文学开篇。该书整理了过往的创作实绩,扶植了年轻的创作力量。如今我们再溯其作品,更能捕捉住美华文学进阶,切实感受作家风格的突变、家国情怀的流变、题材热点的转变和艺术审美的渐变。

2008年初版、2018年再版的《异旅人》回归留学生故事,观照亚裔群体,他们不再失魂落魄,却难免荒疏走板。隔膜依然存在,他们因生命力过强或过弱,表现出与世界不够融合,“适度的强度、竞争、紧张感,既不可能让我无所事事,又不会把人累得只能拖着舌头喘气”(倪煜舸《异旅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算了,装什么多愁善感,我是什么人自己还不明白吗?”(《异旅人》)“留学生”心态的转变,表现为由孤岛“谪仙”、丛林中伺机而动的猛兽,变为“冲着笼子奔跑的熊猫”。“明天一早,他们将学会五种以上的领带打法,再然后,学会放弃,解开领带只需一只手。”(《异旅人》)困境,在新一代亚裔留学生的世界里,是悉数接纳和果断取舍。坚持华文写作,说到底,是抵御遗忘传统的一条路径。

(“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由中国作家网策划)

灾难反思

周励的《亲吻世界》是一部探究人文之秘和自然之险的非虚构文学力作。全书定稿于2020年6月,出版于同年8月。早春二月,庚子伊始,世相骤变。白天,周励与北美文友忙于为武汉医院募捐筹集运送口罩防护服;入夜,万籁俱寂,开始写作,甚至写到晨曦微露。窗外新现万道霞光,她依然沉浸在生命片段的回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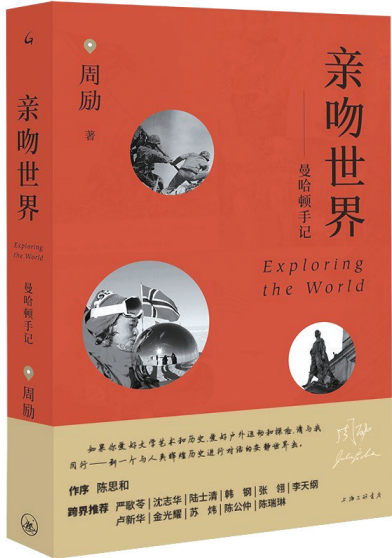
该书第一部分,系列作品《被遗忘的炼狱:跳岛战役探险录》,六篇历史散文正是在疫情期间写成。此次新冠疫情,称作“没有硝烟的战争”,世人视为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极大冲击公众生活、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和国际关系。疫情大蔓延的至暗时刻,周励联想到当年的另一座人间炼狱——跳岛战役血腥惨烈的战场,奋笔疾书,穿梭于二战遗迹和新加坡疫情之间,她一直在反思、缅怀抗日将士的同时,痛惜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空前浩劫,深感“樱花军国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的巨大危害。

《穿越炼狱:冲绳岛启示录》中呈现了惨绝人寰的情景:冲绳岛的各种险峻岩石都成了自杀悬崖,十多万日本平民被日军逼迫集体“玉碎”,由于跳海者众多,1945年夏季悬崖之下形成几层经久不褪的褐色尸浮海浪!周励还引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撰写的《冲绳笔记》。大江健三郎在书中指出,岛上居民的集体自杀是在日军的命令下执行的。勇于直面事实的作家遭到右翼狂热分子的起诉和索赔。经过近三年的缠讼,大阪地方法院在2008年3月作出判决,认定大江健三郎关于许多平民是在军方强迫下自杀殉国的证词,驳回了两名原告的赔偿要求。作者将反思的目光凝聚于冲绳岛平和祈念堂的警句:“发动战争的确是我们人类,但是,能阻止战争的也正是我们人类吗?”

激情燃烧的生命

周励《亲吻世界》漫议

杨际岚



田野调查

《亲吻世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真诚生活、认真读书、追求新知”为宗旨,周励此书,与此何其吻合!她的“真诚生活”,她的“认真读书”,她的“追求新知”,充分体现于她的极为独特的田野调查。

周励自称,由于喜欢历史和二战人物传记的缘故,多年来热衷于研究二战史,带着《罗斯福传》《丘吉尔传》《艾森豪威尔传》《尼米兹传》《朱可夫传》和《隆美尔传》,跑遍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近些年来,环绕太平洋八万里,其足迹遍布帕劳群岛琉球群岛、塞班岛战役、天宁岛战役、关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吕宋岛战役、科雷吉多岛战役(菲律宾战争岛)遗迹和泰缅死亡铁路、桂河大桥,以及广岛原子弹原爆点。她浮潜于贝里琉岛二战遗址“水族馆”,穿越于一堆堆庞大锈蚀、鱼儿出沒的战机、坦克、舰艇残骸

曼岛手记

《亲吻世界》的副题为“曼哈顿手记”。

之间,深感战争的惨烈与凄凉。为了探寻尼米兹石碑之谜、硫磺岛升旗照之谜等,或深入实地踏访,发现被海风侵蚀的青灰色的尼米兹石碑,或出于于硫磺岛纪念碑和国家档案馆,伏案查阅辨析原始卷宗。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浩渺壮阔的时代长河中,涌现了一批批杰出人物。周励视之为“镌刻在心灵岩洞上的壁画”。周励写下一系列以“寻找”为基调的历史散文。她沿着历史人物的足迹,追寻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人生悲喜剧,他们给后人的宝贵启迪。她曾专程前往巴黎附近的奥维尔小镇,梵高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70天。梵高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他杀,证据何在?是谁开了致命一枪?梵高遗体到哪里去了?周励带着未解之谜,在梵高最后的路上一往返走了近十次,而且循着路线来回跑,同时还探访了梵高墓地,终于悟到了悲剧之所在。读到这里,作为读者,也情难自抑地涌起对于卓越的艺术殉道者的深切敬意。

周励称自己对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进行了一次略带探险性质、亲力亲为、绝无仅有的田野调查。她的南极点、北极点、珠峰逐梦,更是带有田野调查色彩的大自然探险。到了南极,冰滑下山。在北极,参加了北纬90度跳海冰冰活动,北极点冰盖长途徒步。前往阿尔卑斯山,乘滑翔伞横穿马特洪峰。一代又一代的勇士用激情、智慧乃至生命谱写了极地探险史诗。周励一往无前地加入他们的行列。

1985年,周励携带40美元赴美自费留学。1992年,她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获《十月》文学奖,一纸风行,发行了160万册,被称为当代留学生文学的经典之作。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亲吻世界》,走过了近30年。周励说,激情与求知欲从未熄灭,唯一的不同是视野的日益开阔和“与时俱进”。诚然,周励始终充满激情。书中,她一次又一次地称颂她所说的“精神导师”海明威格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她所推崇的“雄狮”丘吉尔,他的名言“人最可贵的精神就是无畏”。这些年,她行走天下,更是感到“生命是瞬间,生命在”高处”。

谈到激情,谈到视野,书中提及颇为耐人寻味的事。当年,周励赴美留学,贾植芳先生写了推荐信。周励至今记得,信中写了她在《文汇报》《文汇报》《小说界》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写杨帆的报告文学,说她是一位有潜力的年轻作家,推荐她攻读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学位(后来攻读商学院)。贾植芳文集里有三处写到他与周励的友情和交往。而为《亲吻世界》作序的是陈思和先生。两位是师生关系,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也许算是巧合。然而,偶然寓于必然。江河奔流,薪火传承。文学事业就这样接续不断地、永不止歇地向前推进。

贾植芳先生有一部著作,书名为《把人手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陈思和曾是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发起人之一,在本书序言里,他两处提到,周励在十年中穿梭量般的探险实践,“是被一股巨大的人文力量所推动,促使她去解读历史留存的谜团”;“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周励依然是一个富有文情怀的作家,她在用生命来实践和追求自己一生的理想。”以文学滋养生命,葆有人文情怀,把人手写端正,从《亲吻世界》应能获取这样的感悟。



岁朝清供 李志超作

華馨 唐建威書 HUA XIN